

中国模式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我们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徐崇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国外有人说,仅仅在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9倍,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憩的瞬间,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了严峻考验,并健康而快速地发展中,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2004年,由于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近年来,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我们党和国家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总量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但不同的人是在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审视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统一认识,又是推进这种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一、中国模式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的,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转型期是渐进、增量的,它正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应该慎言乃至禁言。

说中国模式不是由中国人提出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并不取决

于它是已经完成还是正在进行,因为中国模式只是表示它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在发展进程中,这种抉择、道路、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变化的问题,而不是这种模式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认为只有等一种模式已经完成了,才能称之为模式,那就只有在历史的意义上谈论模式,而失去谈论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了。而且这样一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正在进行中的模式了,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世界上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国都要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持谨慎态度,是因为将一国的经验模式化,容易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如使人把它当作可以照着都去做的标准形式。这种说法显然是建立在反对模式的意思有所误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历来认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多样的。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过了20年之后,胡锦涛同志又再次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为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用同一种办法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所以,“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大哥,去发号施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所以,因为怕使人把中国模式当作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形式而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标准模式的。当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在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封中心、企图把苏联模式奉为标准模式强加于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强调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91页)。

三、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不要照抄照搬外国模式,更不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然而,这又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也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又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同志所竭力反对的,只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因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经验都反复说明,这样做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至于中国模式,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叶,中国“如果那时15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就“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5页)。但即使如此,邓小平同志仍坚持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我们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他说:“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

只是参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不反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据此,“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31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同雷默所说“北京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因为中国模式并不把自己看成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共识”,而只是可供他国借鉴和参考罢了。

四、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例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及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标志着中国模式在发生重大的发展变化。但要是以此为据去否认中国模式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认为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中国模式在发展中还面临着凸现出来的种种矛盾和诸多严峻的挑战,这只是说明中国模式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而并不证明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哲学所研究员)

【文汇学人访谈录之二十七】

中国崛起,全世界都充满好奇

——访《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马丁·雅克

本报记者 田晓玲



去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马丁·雅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的新著《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格外引人注目。该书在6月份推出它的美国版后,就受到西方媒体的热议;11月美国版推出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近日,该书中文版《当中国统治世界》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报记者对马丁·雅克先生做了电话专访。

文汇报: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受到日益多的关注。关于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但是有论者提出,这些看待中国的言论,不是高估了中国,就是低估了中国。人们把您的书看作是“中国统治论”或者说“中国例外论”的代表,您是否同意?

答:我觉得,你前面所说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言论,基本是正确的。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非常不稳定,原因在于,西方社会并不理解中国,并没有以接纳性的态度来努力理解中国,而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换句话说,只是以西方人思维的局限性来理解中国。

我的书想表达的是,第一,中国至少在过去30多年非常成功,进步非常明显,而推动这种进步的,并不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复制了西方模式,而是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向西方和东亚模式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我称之为“成长的本土资源”(native source of growth),像政策制定,中国是在学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施行;第二,不能仅仅用西方的思维来理解中国崛起,而应该考察中国独特的背景,其历史、文化和其他国家不同。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中国过去尤其是过去30多年发生了什么,同时理解中国未来会发生什么。

文汇报:您在书中似乎特别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答:我不是说中国和西方什么都不同,当然有相同的地方,这些共同点也很重要。中西方有一种趋同,这一点在全球化过程中很明显。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就在很多方面向西方学习,首先学习欧洲,此后学习日本,再后来

向美国学习。中国究竟要向西方学习什么,一直是争议很大的话题。所以,说中国特殊,并不是否定中西方在某些方面的共同点。

同时,中国又是不一样的;不仅是美国,所有亚洲国家也是这样。一方面,你必须向西方学习应该学习的部分,但同时,必须以自己的方式、在独特的环境下下来实践,包括遵循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西方人之所以很难理解中国,是因为他们长久以来都认为,他们自己的解决方案、安排、答案是普适的。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的疑问通常是:为什么中国做得不一样?在他们看来,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才是对的。这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公共舆论和人们的思维定式中。

文汇报:您的书提到,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那么,这两者仍旧会支撑中国未来的快速发展么?

答: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一轮全球化,我们称之为自由主义时期的全球化,它建立在自由市场、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础上。但是,以全球金融危机为标志,这一阶段已经结束。这不是假设,而是现实。“华盛顿共识”之后,什么将取而代之呢?

在上新一轮全球化中,西方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制定了游戏规则;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西方社会不再是主导,他们的力量被全球金融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没有足够力量来保证二战后他们自己发明的国际秩序的运行。同时,非常清楚的是,尽管中国现在还不是主导力量,但未来的主导力量应该是中国;长期看,我相信人民币会取代美元。

在这一时代到来之前,我们将会处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可能会伴随一些争端。对全球而言,当规则清晰时,一切都会按规则来办;而规则一旦不清晰,那么规则的国家又不再那么强大,那么,结果如何,也就不再清晰。

全球化曾经有利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那时,西方人是欢迎全球化的;但是,全球化不再仅仅满足西方的利益了。从欧美民意测验看,很多人认为全球化不再很好地为他们服务了,而中国则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大多数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全球化是件好事。

人口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很严重。我们看日本的情况,它的老龄化非常快,经济上活跃的人口比重在下降,不足以支撑老龄人口的增加,这使社会负担加重。中国可行的办法,是尽快结束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否则,10年20年以后,人口问题会很突出,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压力。

文汇报: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000美元,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其他许多国家在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所曾遭遇到的问题似乎并没有很大区别,对此您怎么看?

答:人均3000美元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标志性阶段。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些不一样的问题,现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中国比较核心的问题是,经济起飞这一过程目前还没有全部完成。

同时,中国发达地区同其他比较落后的地区之间的差距非常大,而且仍然在扩大,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如何在存在如此之大贫富差距的情况下完成经济起飞,将是一大大挑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会严重影响未来的发展,甚至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文汇报:您在解释中国时使用了“非西方的现代性模式”这一概念,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答:我在自己的书中想说的可能还不是“非西方”,而是“多元化的现代性模式”。直到现在,很多人仍旧认为,只存在一种现代性模式,那就是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我不这样认为。现代性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更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这些因素也不仅影响到社会关系、习俗和制度,也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同时也包括经济制度。例如,日本公司的运行方式就和西方国家的公司有很大区别。趋同的因素与分歧的因素同时作用于现代性,所以,现代性是各不相同的,这些各不相同的现代性也就是我所说的现代性模式。此外,我们只是因为方便起见才把西方国家的现代性统称为西方现代性模式,其实,西方国家之间也是各不相同的。

现在,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正在迅

速现代化,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即不同国家在追求具有不同特征的现代性。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因为现代性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的专利。要想认识各不相同的现代性如何得以构建,日本将是非常好的例子。

关于后发优势,在历史上也有过争议。50年前,人们认为后发国家意味着发展障碍,他们差距太大,依赖性太强;但是现在不同了,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从后发中得到很多优势,他们不需要重复西方国家所要经过的发展阶段,可以跳过某些阶段。这同时也对现代性产生了影响,因为西方的现代性曾经经历过很多阶段。

文汇报:您在书中提到了与“民族国家”相对应的一个重要概念,即“文明国家”。到底什么是“文明国家”,它将会给未来的国际格局带来什么变化?

答:对于理解中国来说,“文明国家”非常重要;在西方,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中国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民族国家”,可能是近百年的事;但是,中国不是近百年的产物,哪怕从秦统一算起,至今也至少有2000年了。在我看来,把中国定义为“文明国家”的首要因素,正是它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有如此长的未曾间断的历史;其次,中国的疆域大小也是它成为“文明国家”的重要因素,从人口和地理来看,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国家”,还是一个大陆,这也非常独特。

19世纪末,中国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才使用的规则,在面对欧洲和日本时表现出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采纳并且适应了“民族国家”的状态,中国被迫将“文明国家”的内容装入了“民族国家”的形态。如今,中国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文明国家”。之所以是“民族国家”,因为它从上世纪以来就适应了国际秩序,而说它是“文明国家”,是因为它的历史久远、多元化、地域宽广。

“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之间会有冲突,可能把中国推向不同方向。如果中国更加自信,不再担心他国对自己的看法,不再那么关注增长和现代化,对自己的历史更自豪,那么,中国就会对自己作为“文明国家”这一点感到更自在,并真正理解什么是“文明国家”。必须认识到,让中国得以自我认同的,并不是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历史,

而至少是过去两千年的历史,包括它的地理、语言、家庭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等。

文汇报:您特别赞赏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并把它看作是中国的软实力。不过,软实力到底仍是一种实力。就文化软实力而言,中国事实上仍旧落后。

答:当然,中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要想拥有巨大的智力、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必须要有资源来从后发中得到很多优势,他们不需要重复西方国家所要经过的发展阶段,可以跳过某些阶段。这同时也对现代性产生了影响,因为西方的现代性曾经经历过很多阶段。

文汇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最近的国情咨文中提到,美国不会接受自己成为世界第二。事实上,美国仍旧是世界的第一强国。您怎么看当今的美国?

答:我觉得,除了军事领域,美国不再是世界的单极力量了。我们进入到一个经济多极化时代。从布什到奥巴马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布什认为未来是美国世纪;奥巴马则认为,不能将美国的力量强加于他国,我们需要合作。

现在只是美国衰落的过程,这将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戏剧化的过程。美国如何来接受自己力量下滑的现实?就像英国在194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他们最终花了几十年才接受了这一现实。美国也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我的书以《当中国统治世界》为书名,并不是说这已经是现实发生了的事。我所说的“统治”,是说中国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成为领导性的国家,以及对国际秩序的制定产生影响的国家。

这并不只是说未来就不会在意别国;任何权力总会遭遇到制约。从未来看,中国会非常重要,美国仍旧会很重要,当然还有其他国家,比如印度、巴西等,都会非常重要。全球格局会进入一个多极化时代。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研讨征文活动通知

为深入研究、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深入研究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深入研究、总结、阐述宣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市教卫党委、市社联、上海社科院、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研讨征文活动,并在征文活动基础上召开理论研讨会,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中国发展道路”理论研讨征文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上海市委落实中央精神的一系列部署和要求,立足上海和上海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深入研究、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研究,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为上海举办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加快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服务。

二、参考选题

1、深入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深入研究和阐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途径、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2、深入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胡锦涛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研究团结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

3、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理论品质、实践基础、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阐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4、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历史进程、实践基础、基本特征、丰富内涵和历史意义,研究阐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5、深入研究阐释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要战略思想;深入研究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6、深入研究阐释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深入研究阐释改革开放面临的复杂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等重要特点的新形势,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7、深入研究阐释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内涵、重大意义,理清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8、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理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9、深入研究阐释我们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深入研究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10、深入研究阐释社会主义文化,理清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的界限,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研究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推动力量,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深入研究阐释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1、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实践、重要成果和历史贡献;深入研究阐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改革创新、推动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和历史贡献,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深入研究阐释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学习型组织建设的问题和实际问题;深入研究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问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3、深入研究阐释上海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新实践、新探索、新成绩、新经验。

14、深入研究上海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深化国企改革,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重大问题。

15、深入研究总结上海建设学习型、创新型组织、改革完善党委领导方式和决策运行机制、创新基层党建、深化党内民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等方面的实践经验。

16、深入研究上海“十二五”发展面临的重大矛盾和问题,特别是深入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17、深入研究“2010上海世博会”对经济、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的深远影响和长远推动作用。

三、征文要求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主题鲜明,观点正确,有深度,有价值。

2、逻辑严谨,语言流畅,文风朴实。

3、论文篇幅不超过8000字,并附100字左右的内容提要。引文和史料要注明出处(统一要求为页下注)。

4、请填写上海市理论研讨征文(2010年)登记表,下载表格请进入www.sh-popps.gov.cn网址的资料下载栏目。

5、论文参考选题供组织论文撰写时参考,具体论文题目由作者自定。

6、请作者将撰写好的论文一律提交到本人所在单位,由各单位汇总后报送至所属系统,由所属系统汇总后报送至征文活动办公室并附电子版。征文活动办公室设在市委党史部理论处。

征文活动从征文活动通知见报日起至2010年9月10日截止。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2010年2月5日